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

(1861—1900)

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



薛化元 / 著

《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》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思潮，尤其在處理中西文化問題上，「中體西用」更是常被提及的思考與型態。但是到底「中體」是什麼？「西用」是什麼？兩個本來不相干的東西又如何能組合成一個思想主張？而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系統接納西方近代文化，又能到達什麼程度？究竟是像持肯定意見的先生們所認為的那樣，可以藉由「中體西用」而開展出民主憲政？抑或是像持反對意見的先生們所認為的那樣，說「牛體馬用」是既不能在邏輯上成立，也不能具體實現的？

本書是薛化元先生對於上列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所含藏的問題所作的深入而有意義的探討。經過這樣的探討，「官定西化理論」的神秘面紗終於可以在讀者面前揭露開來。

ISBN 957-9628-75-0

00250



9 789579 628754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

(1861—1900)

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

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(1861-1900)——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 / 薛化元 二版 -- 臺北
縣板橋市：稻鄉，民 90

面： 公分

ISBN：(平裝)

1. 哲學 - 中國 - 晚清(1840-1911)

848.6

89009437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(1861-1900)
——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

作者：薛化元

發行人：吳秀美

出版：稻鄉出版社

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

印刷：吉豐印刷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 250 元

初版：中華民國 90 年 1 月

ISBN：957-9628-75-0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思潮，尤其在處理中西文化問題上，「中體西用」更是常被提及的思考型態。但是到底「中體」是什麼？「西用」又是什麼？兩個本來不相干，又如何組合成一個思想主張？而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系統接納西方近代文化又能到哪個程度，是如持肯定意見的先生所謂能開展出民主憲政呢？抑是如持反對意見的先生所謂「牛體馬用」，既在邏輯上不能成立，在現實上也隨著清代洋務運動的失敗而破產呢？在既有著作無法解決前述的問題時，筆者不辭淺陋地出版這本『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論（一八六一—一九〇〇）』，希望能初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解析這些問題。

這本書原名『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研究（一八六一—一九〇〇）』，是筆者在論文口試以後，參照口試老師們的意見刪訂的研究成果。正如前面所點出的一些問題點所暗示的，這本著作絕不是無意識的歷史著作，而是帶有濃厚的由問題意識及實踐意識而來的歷史意識：由對現實中西文化問題關心和對民主政治的文化環境的思索，筆者選擇了這個思想史題目做為研究的主题。經過初步閱讀史料，發現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成立，與晚清自強運動密切相關，遂以自強運動推動之年（一八六一）為時間斷限的起點，又以庚子（一九〇〇）以後清廷有一連串的改革措施，思想界也有巨大的轉變，為避免問題過份龐雜，故以一九〇〇年為時間斷限的終點。

在本文寫作期間，承蒙李守孔、李永熾二位指導教授的悉心指導，尤其是守孔師在中文史料方面；永熾師在日文史料以及論文結構、論證和結論方面，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，使筆者受益良多。而張玉法、王樹槐、黃進興三位老師在論文口試時提出的批評，也使本書減少了許多疏漏之處；另外，李威熊、林能士、艾爾曼（B. A. Elman）、王家儉、蘇雲峰諸位師長，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；並承徐泓教授借閱『明實錄』索引的未刊稿，特誌謝忱。

劉靜貞、翁佳音、韓嘉玲、陳美美、孫善豪、王正芬、蔡幸娟諸友代為翻譯部份原文；林慧美小姐和許雪姬、賴惠敏、沈松僑諸學長在資料蒐集過程中，給予了許多協助；楊建國、張立明、林少予、周志宏、劉季倫、殷人珏、汪秀卿、廖美蘭、王璋、黃秀如以及沈淑莉等夜史系諸友幫助繕寫，校對工作。在此，對以上諸友的誠意幫助，深致謝意。當然，這本書得以正式出版，還必須感謝弘文館出版社的協助。

最後，謹向閱讀本書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議：由於牽涉到理學的理论，本書第一章一、二節文字較為難讀，對「道器」論、「體用」論之演進若無太大興趣，可在看完「導論」以後，直接進入第一章第三節；又因為顧及本文的結構與完整性，許多重要的資料和論述不得不放在註釋中（如第一章第一節〔註六二〕對「體制教學」的描述；第二章第四節〔註一七四〕對鄭觀應主張引進的西方法律制度可能對「中體」構成挑戰的討論），因此若時間許可，不要只看本文而略過註釋。

薛化元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一缺齋

修訂版序

碩士論文出版迄今已經四年多，不過，當李明仁兄來電說委託稻鄉經銷的書剩下個位數，需要再版時，還是讓我意外了一下。也就是這個意外，使我有機會處理在初版時因為忙亂而不及修正的一些錯誤，以及對當時出力助成這本書出版的朋友表示謝意。

本來碩士論文口試後，依據口試老師們的意見，進行一些修正，便把論文交給弘文館出版社出版。但是，在打字稿三校送印刷廠以後，弘文館這一部門的負責先生離職，公司不能立刻出版這本書。由於當時博士班報名在即，我手頭上又已經沒有碩士論文修正的打字定稿，十分著急。幸好李明仁兄如同介紹這本書給弘文館出版一樣熱心，陪我跑印刷廠，幫我聯絡裝訂廠，最後並在我阮囊羞澀之際，代我先墊了出版費，這本書才歷經一波三折後出版。而後，我便把成書委託給明仁兄的稻鄉出版社經銷，說起來，修訂版交給稻鄉出版社出版，也可以算是實至名歸吧！

這一次的修訂，有關原版打字錯誤的部份，感謝吾友潘光哲代為校閱，使我在趕博士論文之時，還有餘力加以修正。同時，我也把發表在『當代』的『中體西用』理論能開出自由民主嗎？』，收入本書，希望藉此呈現圍於原本論文的結構，而不適合在論文中討論有關「中體西用」理論的一些問題。並藉此機會給本書加了一個副標——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。最後，特別對

明仁兄五年多來協助本書的出版，表示謝忱。

薛化元

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五日於中和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自序 | I |
| 修訂版序 | I |
| 導論 | I |
| 第一章 思想的淵源 | 一 |
| 第一節 「道器」論之演變 | 一 |
| 第二節 「體用」論之演進 | 二七 |
| 第三節 「道器」論、「體用」論與「中體西用」論之脈絡 | 三六 |
| 第二章 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之成立與早期「中體西用」思想 | 三九 |
| 第一節 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成立背景 | 四〇 |
| 第二節 「中體西用」論的成立 | 四七 |
| 一、魏源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 | 四七 |
| 二、馮桂芬與「中體西用」論 | 四八 |
| 第三節 前期洋務派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 | 六〇 |
| 一、曾國藩、李鴻章 | 六〇 |
| 二、郭嵩燾 | 六七 |

| | |
|--|-----|
| 三、薛福成、馬建忠····· | 七四 |
| 第四節 非主流派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九九 |
| 一、王韜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九九 |
| 二、鄭觀應、湯震、陳熾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一〇六 |
| 第五節 總評····· | 一五九 |
| 第三章 張之洞與『翼教叢編』派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一六三 |
| 第一節 通往「勸學篇」理念之徑····· | 一六三 |
| 第二節 「勸學篇」理念架構之探討 —附論『翼教叢編』派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一八三 |
| 一、「勸學篇」之時代背景····· | 一八三 |
| 二、「勸學篇」理論架構——「中體西用」····· | 一八四 |
| 三、『翼教叢編』派之「中體西用」思想····· | 一九二 |
| 第三節 張之洞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評析····· | 二〇一 |
| 第四章 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之評估····· | 二〇七 |
| 第一節 「東洋道德、西洋藝術」論····· | 二〇七 |
| 第二節 「中體西用」理論的省察····· | 二一二 |
| 第三節 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定位····· | 二一七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結論 | 一三三 |
| 附錄 | 一三三 |
| 參考書目 | 一四三 |
| 一、史料 | 一四三 |
| 二、中日文論著 | 一四七 |
| 三、西方著作 | 一五二 |

導論

在鴉片戰爭中，英國以船堅礮利爲手段，強迫性地打開中國閉鎖的門戶，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，自此而後，中外的關係乃進入所謂的「條約體系」(treaty system)時代(註一)。在西方強迫「開港」以後，隨之而來的，則是「領事裁判權」、「協定關稅」、「租界」、「片面最惠國待遇」等不平等條約的規定。而本文所探討的主題——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——便是在此一歷史背景下逐漸開展的。

受到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刺激，魏源寫成了『海國圖志』和『聖武記』(註二)，在前者中他明白地提出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的思想(註三)。但是，不管魏源的熱忱如何，在『海國圖志』發刊之初，幾乎被當時一般的讀書人所忽略，而在「十餘年之後」，才以太平天國之亂(一八五〇—一八六四)及亞羅船事件(一八五八)的發生爲契機而受到重視(註四)。在咸豐十一年(一八六一)開始推動的自強運動中，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的觀念更成爲運動的重要理念(註五)。不過，無論是自強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曾國藩、李鴻章，或是在咸豐十一年(一八六一)完成『校邠廬抗議』的馮桂芬，他們固然同意魏源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的看法，但是都已經認識到西方的長技背後有其理論(西學)存在，因此爲了「師夷之長技」，便進一步主張「采西學」。而他們最早主張採用的西學，多是與船堅礮利有密切關係的自然科學，如算學、格致學……

等等。隨後由於認識到船堅礮利並非西方富強的唯一因素，商業、工業、法律、議會也是導致西方富強的重要原因，因此鄭觀應等人便主張更廣泛地採用西學，從算學、格致學等自然科學的學習，擴及於商學、法學等諸學科及政制層面。

在另一方面，與西學一樣被稱之為學的中學，在學的概念上及內容上，與西學似有相當的歧異。顧炎武在「答友人論學書」中，便對「學」的概念和內容有所說明：（註六）

「竊以為聖人之道，下學上達之方，其行在孝弟忠信，其職在灑掃、應對、進退，其文在詩、書、三禮、周易、春秋，其用之身在出處、辭受、取與，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、教化、刑法，其所著之書，皆以為撥亂反正，移風易俗，以馴乎治平之用，而無益者不談」

這並非顧炎武一己之見而已，被視為官定朱子學理念主要創發者的朱熹，也有類似的意見。朱熹認為，學主要是學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（五教）而已（註七）。他並明確地對「學」的輕重緩急加以說明，認為「不窮天理，明人倫，講聖旨，通世故，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，此何學問」（註八）。換句話說，朱熹以為「學」的著重點，當在於「五教」或是窮天理、明人倫、講聖旨、通世故。而由於朱熹及其學派的四書、五經注，到了元延祐二年（一三一五）成爲科舉之書，至明永樂十二年（一四一四）又有『五經大全』、『四書大全』的編纂，朱子學成爲地位崇高的官學（註九），其地位更延續到清朝。因此，藉著朱熹對學的探討，當有助於對中學（尤其是官學系統）的把握。

基本上，誠如高田眞治所指出的，「儒教之學的意義，乃是兼有知與行二義，非謂單指以眞

理爲真理而認識，或指學術探求之事之學」，而學與修德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，「以學爲修德之事，以修德爲爲學之內容，則仁義道德、聖人君子卽爲學之實質內容」（註一〇）。這與帶有濃厚科學（science）意味與爲學術而學術的西學，有相當大的不同。

而在晚清最早用文字將中學與西學以「體用」論的形式加以關聯，提出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（中體西用乃其省略語）主張的，可能是甲午戰後的孫家鼐（註一一）。孫氏認爲：（註一二）

「中國五千年來，神聖相繼，政教昌明，決不能如日本之捨己芸人，盡棄其學而學西法。……應以中學爲主，西學爲輔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；中國有未備者，以西學補之，中學失其傳者，以西學還之，以中學包羅西學，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」

在此可以發現，他除了另外點出「主輔」說的「中體西用」論外，重要的是他提出了「中學其失傳者，以西學還之」的說法，在實際的內涵上，他指出，「中國以禮教爲建邦之本，綱常名教，萬古常新」，這就是「體」；「而因時制宜，一切格致之書，專門之學，則又宜博采泰西所長，以翊成富強之業」，這便是「用」（註一三）。由此發現，所謂的西學爲用，乃指於「用」的範疇內採用西學，而此一西學，事實上，包括「西學」與「西技」兩個層次。另外，在討論大學堂採用經籍時，他強調應「以列聖所欽定者爲定本」（註一四），表現對官學體制的支持。由此大致透露了其「中學」所依歸和西學的內容。

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一詞的提出雖是在甲午戰後，不過類似的主張在其前便已經提出過

，如鄭觀應便會清楚地主張「主以中學，輔以西學」，並認為中學與西學「合而言之」時，「中學其本，西學其末」（註一五）。因此，目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中，多認為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是晚清思想界普遍的見解（註一六），在晚清思想脈絡裡，代表著中國傳統士大夫對西方文化進一步的認識（註一七）。

由於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脈絡的重要性，目前的研究成果甚多，張之洞、馮桂芬、鄭觀應、王韜諸人都已有專篇的碩士論文。但就對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作一整體性研究而言，除了閔斗基的「中體西用論考」（註一八）和王爾敏的「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」（註一九）與孫廣德的「調和傳統與西化的中體西用說」（註二〇），以及湯其學「『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』思想的演變」（註二一）、陳旭麓「論『中體西用』」（註二二）、皮明麻「『中體西用』論平議」（註二三）等綜合性中、短篇論文之外，作品並不多。因此，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作一綜合性的研究，仍有必要。其中湯其學、陳旭麓、皮明麻三人的作品是中國大陸最近的研究成果，對於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構成要件和思想的歷史定位問題都有頗具突破性之處，不過或許囿於政治教條對學術研究的限制，過份強調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所謂階級特性，在討論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歷史性質時，有教條導引結論之嫌。而王爾敏對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研究，資料的徵引較前面三人的論文詳盡，將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所包羅的「道器」論、「本末」論等史料一一列舉，並簡單地加以說明，同時也強調此一觀念乃晚清新式教育推展的思想動力。然而由於王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，本來就近於「觀念史」（*history of ideas*）的立場

，因此對於「思想史」(intellectual history) 所著重的思想與歷史環境之「互動」(interaction) 關係，就顯得不足(註二四)。同時，就「觀念史」的立場而言，王文對於「中體西用」的界定與發展，也欠缺「內在理路」(inner logic) 的分析。至於閔斗基的「中體西用論考」一文，則是既有成果中對「中體西用」思想討論較具份量的，不論是在研究史方面，或在「中體西用」與日本「東道西藝」的比較方面，都能補國內相關論文的不足。而前述諸篇研究成果對於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形成的「內在理路」，都欠缺足夠的分析，同時彼此之間對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界定，也相當歧異。

因此，以孫家鼐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為基礎，透過對「體用」論以及一般歸入「中體西用」論重要形式的「道器」論作一歷史性的溯源和討論便有其重要性。所以在第一章中先討論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淵源，包括「道器」論、「體用」論，以及在官定朱子學系統中二者的關聯，和它們與「中體西用」論思考的關係。

甲午戰爭以後，康、梁變法思想勃興，影響到「中體西用」論的評價與定位，故以此為斷限，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分為兩章，第二章中先簡單討論「中體西用」論的成立歷史背景和「經世」思想的特色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關係，其次則討論「中體西用」論的成立，以及此一思想在何時出現。「中體西用」思想成立後，一般認為它沿著兩條主線發展、變化，一條是洋務派官僚思想的發展；一條則是非洋務派主流的「中體西用」論者思想(註二五)。因此接著討論曾國藩、李鴻章、薛福成、郭嵩燾、馬建忠等洋務派官僚(包括與其關係密切者)的思想，而後再討論

非洋務派主流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，並將長年留居海外的王韜獨立爲一，最後討論鄭觀應、陳煥、湯震的思想。

第三章中則以一般人所習知的「中體西用」論者張之洞的思想作爲主題，先討論在「勸學篇」之前張之洞思想的演變和發展，其次分析「中體西用」思想代表作「勸學篇」的思想架構及其產生的時代背景，並論及當時的『翼教叢編』派「中體西用」思想，以探求「勸學篇」的歷史意義，最後再對張之洞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作一通盤的討論。

在大致討論晚清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源流、發展與結構以後，接著則淺介與「中體西用」年代相近、結構相似的日本「東道西藝」思想，作爲評估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參考。然後再介紹各家對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的批評，並從理論架構來探討其思想的「真值」（註二六）。第三節則將「中體西用」思想置於歷史時空的脈絡中，作一歷史的定位，並且簡單討論它的「實際功效」（practical effectiveness）（註二七）。最後，再就全文作一總結。

至於從事此一研究主要參照的方法，是曼海姆（K. Mannheim）的知識社會學，尤其是「關聯論」（relativism）（註二八）。由於它的啓示，注意到歷史的「存在拘束性」，而將不同時期的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對照不同的時空條件，予以不同的評價（註二九）。同時，從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觀點來看，「否定一個觀念的真值」與「確定一個觀念的功能」是有所區別的。如果是懷疑或否定一個觀念的真值時，仍然是將此觀念視爲「題旨」（thesis），與此觀念立於同一理論基礎之上從事探討；反過來說如果不管此觀念所斷言的是否爲真，而只注意此觀念所履行的理